

科 举

科举文化与科举学

上

KEJU WENHUA YU KEJU XUE

上海嘉定博物馆/上海中国科举博物馆 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科举文化与科举学/上海嘉定博物馆 编. —福州: 海风出版社, 2007.4

ISBN 978-7-80597-672-3

I. 科… II. 上… III. 科举制度-中国-文集IV. D691.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042221号

科举文化与科举学

上海嘉定博物馆/编

责任编辑: 吴德才

出版发行: 海风出版社

(福州市鼓东路187号 邮编: 350001)

出版人: 焦红辉

印 刷: 上海益晨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85X260毫米 1/16

印 张: 14印张

字 数: 6000千字

印 数: 2007年5月第一版

版 次: 2007年5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597-672-3/C.8

定 价: 58元 (上、下册)

科举文化 与科举学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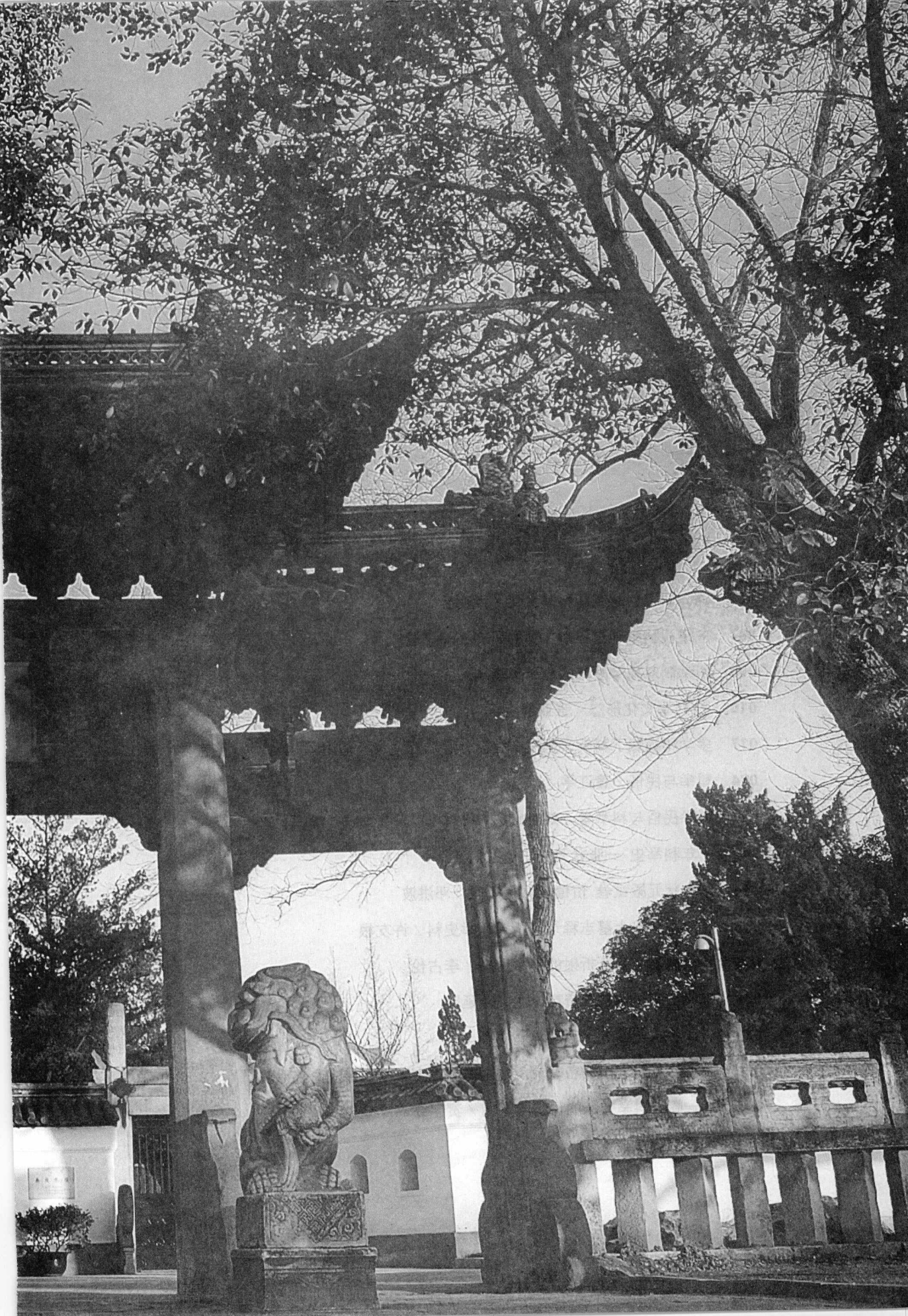
上海嘉定博物馆
上海中国科举博物馆

编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项目

海风出版社





目录



- 006 深入研究科举制和科举文化 / 武克全
- 007 应重视科举制与科举文物的研究 / 陈燮君
- 008 科举制对高考改革的启示 / 李瑞阳
- 010 论科举文化形态 / 张亚群
- 017 多学科视域下科举文化控制社会分层功能浅议 / 冯用军 郭锐华 张宝昆
- 024 科举与民俗 / 黄江平
- 034 科举民俗与科举学 / 刘海峰
- 042 千年科举史 一张状元卷 / 赵铁信
- 044 国宝状元殿试卷 价值连城疑有假 / 邓洪波
- 053 《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所见科举史料 / 许友根
- 058 《杨灏墓志》所折射的科举生态 / 李占伦
- 063 宋代科举研究文献资料论述 / 龚延明
- 073 洪武十八年榜进士考实 / 邱进春
- 082 《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进士籍贯刊误述论 / 毛晓阳
- 092 天一阁藏科举文献的保护与利用 / 贺宇红

科举文化

新时期的社会与科举学——科举文化与科举学



- 098 科举废除前夕上海地区的社会舆论 / 谢俊美
- 103 从二十五史的相关信息看状元地位的衍变 / 周腊生
- 113 也谈明代前期科举社会的流动率 / 沈登苗
- 123 潘光旦的科举研究述评 / 林介宇
- 129 从明清福建科举事业的兴盛看海洋文化的提升 / 王日根
- 138 乾嘉学派与科举 / 陶继明
- 146 徽商与明清徽州科举业的发达 / 李琳琦
- 150 明代山东进士的区域分布研究 / 刘希伟
- 159 浅论中国科举制度兴衰和嘉定徐寿祺堂在清代科场活动 / 徐俊彦
- 166 宋代科举制度下的嘉定望族龚姓 / 龚丹
- 169 关于清代科举中的几个问题 / 商志谭
- 190 科举制度的定义与起源申论 / 张希清
- 200 应重视对科举落第问题的研究 / 李世愉
- 207 宋代的贡举“移民”及政府对策 / 朱瑞熙
- 218 对科举制度的再认识 / 孙培青

深入研究科举制和科举文化

——在“科举文化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 武克全

上海社联副主席、研究员

各位专家学者，同志们、朋友们：

首先，请允许我对上海中国科举博物馆和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主办的“科举文化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对来自兄弟省市的专家学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国科举制度历史悠久，从隋代大业元年开始，到光绪三十一年废止，整整绵延了一千三百年。科举制度影响深远，形成了中国特有的科举文化现象，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从而成为中华民族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

科举制度废止一百年了，而作为一种选官制度，它一直是众多学者研究的对象。令人可喜的是，近年来的科举制度研究十分活跃，突破了极“左”观点的束缚，比较客观地评价它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曾起过的积极影响，充分肯定它对祖国的统一、社会的和谐稳定、各民族的团结融合，尤其是对古代教育事业和儒家文化发展的重要作用。今天，深入研究科举制度，对于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主精华，改革现行考试制度，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疑可以提供有益的借鉴。这次举行的“科举文化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既是对科举制度研究的深化，也是为搭建历史与现实相连接桥梁的一种很有意义的努力。

嘉定是一座历史名城，人杰地灵，有着丰富的人文历史资源。借此机会，我代表上海学术界对嘉定区党政领导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他们对历史文化建设的重视，感谢他们举办了这样一个很有意义的学术研讨会。至于上海中国科举博物馆的领导 and 同志们，更是为科举制度的学术研究、科举文物的保护，付出了辛勤劳动，值得我们向他们学习。

最后，祝学术研讨会圆满成功，与会同志们身体健康！

应重视科举制与科举文物的研究

——在“科举文化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书面讲话

● 陈燮君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上海博物馆馆长、研究员

各位来宾、各位专家学者：

我十分高兴地参加这次由上海中国科举博物馆和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主办的“科举文化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

今年二月，我参加了上海中国科举博物馆隆重而热烈的开馆仪式；事隔八个月后，我又参加了这次科举学术研讨会，聆听各位专家在江南古城嘉定开坛评讲、各抒高见，可以说，真是好事成双。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而其中科举史就占了一千三百年，它是中华文明演进、考试制度趋于成熟的标志。研究和总结科举，对改革考试制度，建设先进文化，构建和谐社会，提高执政能力，都能提供有益的借鉴。

科举涉及方方面面，渗透到社会、文化、教育、伦理、道德、民俗、民风等各个领域，形成了我国特有的科举文化现象。科举文化博大精深，是一笔丰富的历史遗产，也是一个可以不断探讨的课题。

科举制度已经废止一百年了，亲身体验过科举的都已成为故人。如今要研究科举，除了需要阅读大量的文献资料外，还需要以科举文物作为实证进行研究，文献和文物是科举研究的基础，两者密不可分。因此，历史工作者与文博工作者要形成合力，进一步拓展科举研究的空间。这次“科举文化与科举学”学术研究会就是一次有益的尝试，也是一个良好的开头，我相信，这次研讨会不仅对科举学术研究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还将对科举博物馆的建设和发展有良好的推动作用。

“科举文化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从筹办到正式举办经过了9个月，上海中国科举博物馆和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的同志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在这里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科举制对高考改革的启示

——在“科举文化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 李瑞阳

上海市教育考试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同仁：

大家好！在废科举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在嘉定召开“科举文化与科举学”的学术研讨会，总结和反思科举制的千古得失和科举文化的历史遗存，作为考试实际工作者，我很高兴能参加这次高水平的学术盛会，同时，也代表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对出席这次会议的领导、专家和同仁表示热烈的欢迎。

作为古代的文官选拔制度，科举制对古代社会的政治、社会、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和科技等方面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同时，它对现代的公务员考试、教育考试等制度也都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可以说，研究和揭示古代科举制的发展和演变，将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考试的积极和消极功能，有助于推进现实的考试制度改革。借用一位老领导的话，就是中国需要“科举学”。下面我仅从科举制对当代高考改革的影响和借鉴来谈点自己的看法，不当之处请专家们批评。

第一，科举制公平取才、平等竞争的精神对高考改革的启示。科举制实行“怀牒自列于州县”的自由投考制度，使考试的大门向全社会各阶层开放，除“娼、优、皂、吏”之外，所有的人（女性除外）都可以报考，这在古代社会还是具有相当的平等精神的。录取时，“一切以程文定去留”，努力消除主观因素对科举取士的影响。同时，为保证考试的程序公正，还制定了一系列的防弊制度，如弥封、誊录、磨勘、回避等。在清代的《钦定科场条例》中，对科场中可能出现的舞弊行为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规定，防范之严，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考场的用笔为例：外帘官只能用紫笔，同考官只能用篮笔，誊录生用朱笔（因此有“朱卷”之称），对读生用黄笔，正副主考用墨笔，这就是所谓的“五色笔”。有人认为：世界上没有比科举考试防范更为严密的考试了。因此，无论是从报考资格、录取标

准、公平选才和考试技术等方面，科举制的确有许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比如，在高考录取时，人们还是对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深信不疑，比起推荐和面试等方式，大家还是更愿意相信分数。另外，在大家都非常关注、也即将出台的《考试法》中，也应该从技术层面借鉴科举法的某些经验，为考试改革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第二，科举考试的科目演变对高考的科目改革也有值得借鉴的地方。我们知道，唐代科举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很多科目，而到北宋中叶以后就逐渐合并成立进士一科。为什么会出现考试科目和考试内容越来越统一的情况呢？主要是为了追求公平和操作简便的问题。1999年广东实行“3+X”的改革，因为科目组众多、难以操作。并且造成了新的偏科现象，所以为了防止偏科和操作的简便易行，第二年就推出了“大综合”考试。所以，考试科目的演变有内在的规律和原因，因此，认真总结和研究科举时代考试科目演变的一般性规律，对于高考改革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第三，科举分地取人的制度对高考录取制度的改革也有启示意义。宋代科举在州府一级的发解试中实行配额制度，明代在会试中实行了南北卷制度，到清代就发展为分省定额取中制度了。实行这种分地取人的政策，可以提升落后地区的文化教育水平、增进民族融合以及维护社会稳定。与此类似，现代高考中也出现了“倾斜的高考分数线”的问题，近几年的“两会”会议上都有关于实行统一录取还是分省录取的争论，有不少人认为应实行全国统一考试、统一录取的办法。

谢谢各位！



论科举文化形态

● 张亚群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导，厦门大学大学考试研究中心副主任

近些年来，随着传统文化热的持续升温和科举研究的深化，科举文化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科举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生、演化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密切相连，并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进程产生重大而深刻的历史影响。一百年前，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巨大冲击下，以儒学为主导的科举考试制度难以适应教育变革和社会现实的需要，最终被新的学校考试制度所取代，科举文化从此成为历史的名词。社会变迁与自然侵蚀，特别是近百年来对科举制的激烈批判以及其他人为因素的影响，使物质形态的科举文化大量流失。时过境迁，现代人对于科举文化的认识，除了书本介绍的科举知识外，往往缺乏真实的感受。科举文化具有多种表现形态，涵盖观念、制度与物质文化诸层面。关于科举制度，学术界多有讨论，此不赘述。本文主要从语言文字、考试文体、建筑文物、风俗文化层面，论析科举文化形态的特点及其历史变迁，以加深对科举文化属性的认识。

一、科举术语

一种独特的文化在其形成和演化过程中往往衍生出一套话语体系与特殊意境，科举文化亦不例外。从表现形态来看，科举文化所展现的首先是汉语汉字文化。“在漫长的中国科举史上形成了成千上万个科举术语和词汇，这些科举术语加上现代人在科举研究中概括出的一些词语和概念，构成了‘科举学’庞大而专门的概念体系”。^①科举术语和词汇的生成、演变与盛衰，不仅真实地记录了科举文化变迁的历史轨迹，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科举文化的鲜明特色。

科举术语具有来源广、数量多、涵义深刻、传播久远等特点。

科举术语是在考试选才的社会实践中逐渐积累而来的。在科举制创立之初，一些科举术语来源于先秦的选士制。如“进士”一词最早见之于西周选士活动：“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②隋代以后，“进士”一词逐渐演化为科举文化的一个关键术语。其含义有二：一为科举考试常举科目“进士科”，始于；二指经进士科考试的举人，或经过考试合格而获得的一种出身。汉代

刘海峰：《科举术语和“科举学”的概念体系》，《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礼记·王制》。



开始的察举制是科举术语的又一重要来源。作为科举选士之先河，察举制下的选士名目直接为科举所继承。此外，科举术语的形成更多地来源于科举考试活动，并且随着科举考试制度的改革而不断衍生出新的名称。总体而言，隋唐时期是科举术语的初创阶段，宋代科举术语大量增加和发展，明清时期科举术语趋于定型和完备。

历史上流传的科举术语，数量众多，难以确切统计。今天，一般中文工具书或多或少都收入一些科举名词，而专门的科举书籍和工具书收入的相关词条则更多。《辞海·历史分册》（中国古代史）将科举制度作为独立类别，列有条目197个。李茂肃主编的《科举文化辞典》共设词目2300多条，其中“科举基础知识”部分所列隋至清代科举词目就有445条，有的词目包括多个科举名词术语。毛佩琦主编的《中国状元大典》，列有科举释词756条。如“一甲”、“乙科”、“号舍”、“至公堂”、“乡贡”、“省试”、“殿试”、“朝考”、“公车”、“行卷”、“文魁”、“三元”、“同年”、“功令”、“科场”、“验丁”、“移席”、“领房”、“弥封”、“誊录”、“锁院”、“金榜”、“传胪”、“翰林”、“馆选”、“举业”、“程文”等。这些都是科举文化中较为常见的术语。在日常生活和文学作品中还有不少特殊称谓，如“白丁”、“相公”等。

科举术语不仅记录、描述古代中国和东亚一些国家或地区培养和选拔人才的社会活动，而且赋有丰富的文化意蕴。唐代进士科考试就有“探花”、“探花使”、“杏榜”、“龙虎榜”、“宾贡”科等称号，形象生动，寓意隽永。唐代省试发榜约为农历二月十五日，正值杏花盛开的季节，故称省试榜为杏榜。新科进士在曲江之杏园举行宴会等庆祝活动，时值百花迎春，以新第进士少俊者而认为探花使，带领大家遍游长安名园。北宋初年，仍然如此。南宋时始称殿试一甲第三名为探花。美国学者贾志扬指出：“宋代科举制度最引人感兴趣的特征之一是往往用丰富多彩的词汇来代替比较枯燥乏味的制度术语。”这些词汇有时强调的是古代的先例和皇帝在选举中的作用，如“大比”、“贡院”、“乡贡”、“贡士”；在另一些场合则强调成功的光荣，如称殿试第一名为“状元”、“大魁”或“龙首”，称所公布的及第者名单为“榜”或“桂籍”；也有些名词强调的是考试的关防和通过考试的困难，如称试院考场为“闱”或“棘闱”等。“这些可以容易地增多的语言创造的例子，是科举在宋代优秀分子社会中具有文化上的重要意义的证明”。^①科举名词的丰富多样，为科举文化增添了异彩。

科举术语作为古代考试文化的载体，随着科举制的推广而不断传播，在演化过程中具有传承与变异的双重特性。一方面，科举术语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独立性，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传播、流行，从不同侧面反映出科举考试的历史活动。另一方面，因科举考试制度、考试科目及社会文化教育的变迁，或受东亚其他国家民族、文化因素的影响，一些科举名词术语的名称、含义随之发生变异。如“秀才”、“学究”、“状元”、“进士”、“举人”名称与含义的变化。清末以来，由于教育和社会文化的巨大变革，以科举考试为重心的传统教育制度为新的学校教育及考试制度所替代，绝大多数科举术语逐渐成为语言文化的陈迹，但仍有不少科举用语传承、遗存下来。

科举时代所习用的一些词语，如“入学”、“入闱”、“八股文”、“口试”、“中额”、“文科”、“白卷”、“格式”、“考官”、“主考”、“总裁”、“阅卷”、“秀才”、“状元”、“冒籍”、“枪手”、“顶替”、“关节”、“落第”、“糊名”、“覆试”、“督学”、“教授”、“选举”等，在废科举百年之后，仍见之于教育和其他社会用语中，只是大多被赋予新

① 贾志扬：《宋代科举》，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出版1995年版，第231页。



的含义。至于科举文化所孕育的谚语民谣和成语典故，如：“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英雄入彀、白衣公卿、天子门生、金榜题名、独占鳌头、鱼跃龙门、郎才女貌、可圈可点、出口成章、炙手可热、朱衣点头、连中三元、黄粱美梦、光宗耀祖、名落孙山、沆瀣一气、怀才不遇等，则流传更广，为世人所熟知。

二、科举考试文体

科举文化具有古代考试文化的性质，考试文体是其重要的文化表现形态。科举制度通过分科分级考试选拔行政人才，考试文体则以考题的形式成为这种选拔机制不可或缺的测试手段。科举时代，“科文”^①流行，并受客观文学潮流变化、考试主办者的选才要求以及选拔性考试的演化规律等因素的影响而科举考试文体不断变化，形成“策”、“论”、“杂文”、“诗”、“赋”、“判”、“经义”、“八股文”等多种文体类别。每种考试文体各有其特定的行文格式、写作限制和衡文标准，科举考官通过规定的考试项目和答卷，评定考生的知识、能力水平，择优选拔人才。

汉代实行察举制，产生了带有考试文体性质的“对策”。魏晋至隋代，对策始终是选贤的方法之一。隋炀帝创立进士科，以试策取士。“唐代以后，散体的策论仍旧在科举考试中保留下来。”^②作为一种常用考试文体，策论属于论述题，主要考察、检测应试者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策论题提出有关现实的政治时务或经史中的问题，考生以议论文方式应答。唐代策问分为经策、子策和时务策，前二者考察举子对经史子集的掌握程度，时务策主要以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现实问题检测考生从政处事的实际能力。这就要求考生须懂得一定的时务之学，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学子关注现实问题。另一方面，由于策题与现实联系密切，往往导致猜题、模仿、片面追求答题技巧、难辨真才等弊端。

科举制创立不久，读书人为了揣摩、应对策论考试，多偏重策文的练习、钻研。这不仅削弱了经史的学习，而且直接影响到科举选才的效度与信度。唐高宗永隆二年（681年）八月敕文指出：“如闻明经射策，不读正经，抄撮义条，才有数卷；进士不寻史籍，惟诵文策，论综艺能，遂无优劣。”因此，朝廷开始变革科举考试文体和考试办法，宣布：“自今已后，明经每帖经十得六已上者，进士试杂文两首，识文律者，然后令试策。”^③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改革进士科考试内容，规定考时务策五篇，箴、论、表、赞各一篇。作为文体，“箴”用以规戒，“论”用于说理，“表”用于臣民对皇帝的奏议或陈述，“赞”以称颂为主。在吏部试中，使用“判语”作为专用文体，属于判断刑狱案件的评语。

清代学者徐松考证认为：“按杂文两首，谓箴、铭、论、表之类，开元年始以赋居其一，或以诗居其一，亦有全用诗、赋者，非定制也。杂文之专用诗、赋，当在天宝之间。”^④这里的赋是指律赋，与汉魏以来的古赋、骈赋不同；诗则是指后世所称的试帖诗，二者都是注重声音对偶用韵的韵文文体^⑤。傅璇琮教授对于唐代

① “科举之文”的简称，是指在科场中产生的各类文体和文章。参刘海峰：《科举学导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6页。② 卞健行：《科举考试文体论稿：律赋与八股文》，“前言”台北：台湾书店1999年版。③ 《唐会要》，卷七五，《贡举上·帖经条例》。

④ 徐松：《登科记考》，卷二，《永隆三年》条。

⑤ 卞健行：《科举考试文体论稿：律赋与八股文》，“前言”台北：台湾书店1999年版。



进士试杂文的演变轨迹作了补充论证,并提出:“进士科在八世纪初开始采用考试诗赋的方式,到天宝时以诗赋取士成为固定的格局,正是诗歌的发展繁荣队当时社会生活产生广泛影响的结果。”^①由此可见,以考试文体为重要表现的科举文化形态之演化,是与考试选才要求、文学发展状况依存互动的。

北宋初年,科举考试文体沿用唐制,进士科首重诗赋,“判语”也是考试内容之一。在宏词、拔萃等科中,“表”为必考内容。随着科举制度的变革与推广,要求改革诗赋考试弊端的呼声不断兴起。宋神宗时,王安石开始改革科举考试科目,罢去诗赋、帖经、墨义,改考经义、论、策。所谓“经义”,是指从儒家经典中抽出文句作为考题,应试者阐明其义理。王安石本人就作过经义《里仁为美》一文,流传至今。其后,诗赋考试时复时罢。南宋时期,科考文体逐渐定型,经义与诗赋并重。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年),博学鸿词科有诏、诰的考试内容,二者属于以皇帝名义发布的公文文体。

明清时代,在经义、诗、赋与策、论的基础上,形成了高度程式化的考试文体——“八股文”。八股文又称“八比文”、“制艺”、“时文”。其特点是,以《四书》、《五经》命题,体用排偶;行文略仿宋代经义,要求代“圣人”立言。题目来自《四书》的,称“四书文”或“四书义”;来自《五经》的称“五经文”或“五经义”,又称“经义”。这种文体通常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出题、中股、后股、束股、落下十部分组成。其中“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段为全篇主要部分,每段中均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共八股,故而得名。明清时期乡试、会试头场试《四书》、《五经》,均用八股文,其书写格式和字数也有严格限制。

八股文作为一种考试文体,对于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学校教育、文风士习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明末至晚清一直为时人所抨击。废科举后,八股文几成落后文化的代名词,不断受到世人的批判。近一二十年来,随着科举评价趋于客观和理性化,学术界对于八股文的起因、性质、特征、功能及历史影响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做出新的评价。八股文的产生与流行,在很大程度上是适应考试测验的客观要求,也是与“汉语、汉字的单音四声条件、对仗思维特征、传统文化儒家的五经、《四书》等文献理论教育内容”密不可分的^②。启功先生在《说八股》一文中曾指出:“其实‘八股’是一种文章形式的名称,它本身并无善恶之可言。只是被明清统治者用它来做约束士子思想的工具,同时他们又在这种文章形式上加上些个繁琐而苛刻的要求。”^③科举文化演化出八股考试文体及其对其他文化形式的影响,确实值得我们作深入的研究和客观的评价。

伴随科举考试文体的演化,在读书人中和社会上形成了相关的学问,时称“科举之学”或“科举学”,如“策学”、“文选学”、文字学、音韵学、书学、制艺程文等。从唐代开始,围绕备考科举文体而产生的专门学问“策学”、“文选学”就备受考生重视。唐初重策论,遂形成了“策学”。即使是在唐玄宗天宝年间(742-756年)诗、赋考试盛行之后,策论在科举选士中仍举足轻重,为士人所关注。唐代“策学”书籍有白居易的《白氏策林》等。宋代以后“策括”之类的书籍盛行。清代“策学”著作有《策学备纂》、《策学备纂续集》、《策学例言》、《策学渊萃》、《策学百万卷统编》等^④。就策问内容而言,一般为传统的经史之学和时务知识,但清末科举考试改革后,也融入了西方近代社会科学和算学等学科知识。

在进士科考试的直接推动下,李善所注的《昭明文选》成为士子赋诗作文的范本,“文选学”

① 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09页。

② 邓云乡:《清代八股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

③ 启功等:《说八股》,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页。

④ 刘海峰:《科举文献与“科举学”》、《台大历史学报》2003年第32期。



应运而生。北宋初期，“文选学”很发达。“方其盛时，士子之谓之语曰：‘文选烂，秀才半。’”南宋崇尚苏轼文章，其文俨然成为科场士人所模仿的新“文选”，因而也有语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①明清时期所流行的八股文，其源头可溯至律赋，它将科举考试文体推向极致。

在文字学、音韵学领域，也留下科举文化的印痕。成书于唐代前期的《干禄字书》，适应了科举选士的时代要求。科举考试作文要写正字，因此文人学士对文字书写倍加重视。颜元孙将其书取名“干禄”，并对唐代文字的正体、通体、俗体加以区别和辨析，实际上是为读书仕进者提供必要的临池指南。这在其撰书缘由及体例中得到反映：“所谓正者，并有凭据。可以施著文章、对策、碑碣，将为允当。进士考试，理宜必遵正体，明经对策，贵合经注本文，碑书多作八分，任别询旧则。”^②《干禄字书》的问世及其广泛流传，对规范当时的社会用字起到了非常明显的作用。

由于中晚唐贡举考官严格要求遵守有关声病的规则，应试士人需要参考实用的诗律指南，因而对音韵学产生某些影响。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迫使《切韵》改变韵序，照顾声律；二是出现《切韵》的多种增字增注本；三是出现了分韵编排，临文备查的类书；四是“诗格、赋格”流行^③。北宋时期颁行的《礼部韵略》是当时考官和举子共同遵守的官韵范本，流行甚广；后来演变为“平水韵”，到清末一直控制了科举试题的用韵。

三、科举建筑文化

正如教堂、寺庙是宗教文化的象征，科举文化也有自己独特的物化形态，贡院、会馆、进士题名碑、科甲功名牌坊以及进士宅第就是其典型表现。这些与科举考试密切相连的建筑物，普遍存在于科举时代，具有独特的文化意蕴。历史上其分布之广、数量之多、影响之大，足以与宗教建筑物相抗衡。

贡院是举子参加考试的考场，始建于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其后历代相沿。明清时期，贡院设立于省城和京城，有的贡院为两省合用，如江南贡院；顺天府贡院位于京城，为乡试和会试场所，具有独特的地位。作为科举考场，贡院一般建于城东南方，为“天门”方位，寓意吉祥。贡院是封闭性建筑物，主要由正门、仪门、龙门、明远楼、号舍、至公堂、戒慎堂、衡鉴堂等几部分组成，各有分工。贡院内建筑物的设置、命名及匾额、对联，集中反映了科举文化的意蕴。以江南贡院为例，其门前有一对石狮护卫，显示贡院的神圣与威严；大门两侧白玉石碑牌坊各书“明经取士”、“为国求贤”，表明贡院设置的目的。明远楼有对联：“矩令若霜严，看多士俯伏低徊，群器尽息；襟期同月朗，喜此地江山人物，一览无余。”至公堂的对联为：“号列东西，两道文光齐射斗；帘分内外，一毫关节不通风。”科举考试的严明、整肃于此可见一斑。

会馆源于汉代，形成于明代，按其性质可分为士绅、试子会馆与工商会馆，前者主要为举子赴京参加会试提供各种服务。明清时期，北京科举会馆林立，多集中在距贡院较近的宣武门一带。适应科举考试的需要，这类会馆的数量不断增加，规模扩大，形成颇具科举文化特色的“宣南文化”。不少会馆建有聚会、筵宴、文娱乐场所及祭祀神仙、魁星或乡贤的庙宇。如湖广会馆内有大戏楼、乡贤祠、文昌阁、宝善堂、楚皖堂和花园。“闽中各会馆还在馆内设置科举题名版额，详列中式者姓名、籍贯、会试时间及第等位，有的会馆还在供奉地方神灵之外排列地方名贤”，这些“既体现了本乡土过去文化建设的成就，亦成为激励后人的理想场所。科举事业亦得以在这文化氛

①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0页。

② 施安昌：《关于〈干禄字书〉及其刻本》，《故宫博物院院刊》1980年第1期。

③ 平田昌司：《〈切韵〉与唐代功令——科举制度与汉语史第三》，载潘悟云主编：《东方语言与文化》，东方出版中心2002年版，第341—342页。



围的薰育中继续发展。”^①

早在唐代就有新科进士雁塔题名之举。自宋代开始，殿试榜公布后，建碑于国子监，按新及第进士甲第先后，刻姓名、籍贯于碑上。在河南嵩山中岳庙至今仍存有宋、金四块状元碑。山西大同市南城墙东段的雁塔中，自第2至第7层每层塔壁上均享有进士题名碑，刻录大同地区历代举子的名字。陕西耀县博物馆存有《前代进士题名碑》，刻于明嘉靖年三十九年（1560年），共有唐、宋、金、元进士82名、举人8名^②。北京东城区安定门内成贤街孔庙内，至今保存了科举文化的重要历史见证——《进士题名碑》，其中元代3座，明代77座，清代118座，共记载51624名进士的姓名、籍贯和及第名次。2004年北京市政府为迎接奥运会的胜利举办，开始拨专款维修孔庙，并为明清进士题名碑加盖玻璃房，进行保护，使之成为举办人文奥运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全国各地散见的科甲功名牌坊、进士宅第等，也留下了科举文化的痕迹。福建泉州、漳州等地至今存有与科举有关的牌坊、碑、亭。漳州市芗城区现存明代“尚书探花”石坊和“三世宰贰”石坊，分别记载林士章、蒋孟育的事迹；长泰县的“春风桃李、秋水鱼龙”坊，上面题刻着当年考中举人、进士的学子芳名；龙海的“林魁进士”坊、诏安县的“夺锦坊”和“父子进士”坊、东山县的“纶章垂耀”坊等，均为庆贺科举及第而设。在漳浦县乌石，闻名闽南的古建筑——海云家庙（林氏宗祠）前广场，至今仍存有一座八角形旗杆基座，它是明嘉靖探花林士章的旗杆，成为漳浦县乃至漳州府科举顶峰的历史标志。林氏家庙曾留下“进士”、“父子进士”、“兄弟举人”、“文魁”、“巨魁”、“拔元”、“贡元”等匾额（文革中被毁，近年陆续重修）。这些文物深受台湾林氏后裔的重视。

江西临川现存部分进士宅第，具有独特的建筑文化风格。进士宅内不仅有丰富多彩的木刻与石雕，其柱顶石还具有深刻的文化韵味。如有的进士第有100个柱顶石，予以百年树人大计^③。在皖南地区，现存有号称“徽州第一坊”的许国大学士坊等科举文化遗存。屹立于贵阳东门月城上的文昌阁，是贵州省上百座文昌阁中仅存的规模最大的一座，即为科举文化的产物。

上述科举建筑文物既是当地文风鼎盛、人才辈出的历史见证，也是科举文化的珍贵遗存，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看到古村落的义塾与书院，看到那巍然高耸的文昌阁和文峰塔，看到宗祠前为举人、进士树立的旗杆和村口的牌楼，看到住宅扇窗上精细的‘琴棋书画’或者‘渔樵耕读’的雕刻，你才能真正理解农村的‘耕读文化’，理解‘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科举之梦在农村的重大意义。”^④

四、科举习俗

科举考试作为全国性、大规模、长期的社会活动，不可避免地对民风世俗产生深远影响。历史上科举考试年复一年，周而复始，俨然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教育与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作为国家“抡才大典”，科举具有一系列庄严的仪式与礼仪。伴随科举选士，从政府到民间，各地形成诸多相关民俗文化。其种类之多、流传之广、延续之久，堪与岁时节庆等民俗文化相媲美。

以饮食文化为例，科举时代流行为新科举人、进士等举办宴庆活动。唐代乡贡试毕，长吏以乡饮酒礼款待举人，宴席间陈俎豆、备管弦，牲用少牢，歌《诗·小雅·鹿鸣》之诗，习称为“鹿鸣宴”。宋至明清，乡试沿袭这一礼俗。唐代贡举礼部放榜、关试后，新及第进士凑钱在长安城东南的曲江池畔，宴集赋诗，观赏杏花，泛舟奏乐。这就是闻名的“曲江宴”，又名“曲江会”、“关

① 王日根：《论明清福建会馆的多种形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

② 金其桢：《中国碑文化》，重庆出版社2002年版，第917页。

③ 魏莉、金茨萍：《挖掘新的旅游资源——从临川进士第文化遗产谈起》、《企业经济》2004年第4期。

④ 刘经富：《从耕读之家到文化世家》、《读书》2005年第2期。